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语境观的再分析

魏晏龙, 田建国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和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进而提出只有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才能对一段话的意义做出评价。文章从简述马氏语境观的形成过程入手, 进而通过比较“情景语境”理论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挖掘“文化语境”的内涵、分析“文化语境”与语境的关系等几方面来集中探讨马氏的语境观对于当今语境研究的潜在价值和特殊意义。

关键词:马林诺夫斯基; 语境; 情景语境; 文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 H 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2-0074-07

The Re-analysis of Malinowski's Perspectives on Context

WEI Yan-long, TIAN Jian-guo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Polish-British anthropologist B. Malinowski, also known as the co-founder of functionalism, argues that there exists a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ts context and that the context plays a vital role for people to make sense of language. He accordingly holds that language can by no means be exactly assessed or comprehended without being set in its “context of culture” or its “context of situ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B. Malinowski's perspectives on context anew to find out the potential values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oday's relevant research on context. The paper consists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 Malinowski's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a systematical comparison between B. Malinowski's theory of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J. Austin's “Speech Act Theory”, a connotative probe into B. Malinowski's “context of culture”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text of culture” and context.

Key words: B. Malinowski; context; context of situation; context of culture

收稿日期: 2011-12-06

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振兴基金资助项目(RW201018)成果

作者简介: 魏晏龙(1977-), 男, 山东昌邑人,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外语教育系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及语用学。

一、引言

对于初涉语言学研究的人而言,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这个名字或许是有些陌生的。然而正是这位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的语言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好友、著名的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 R. Firth)的语言理论。马氏的语言观从形成到发展成熟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的事,这一时期的世界语言学研究的主导理论是从对某一历史阶段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进行观察与分析研究为主要特点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又叫美国描写语言学);而在语言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乔姆斯基革命,即以乔姆斯基等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逐渐取代了结构主义学派而成为语言学界的主力军,也是在马氏语言观发展成熟以后二三十年的事了。马氏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角度出发,论证了“情景语境”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情景语境不但在后来成为系统功能语法学派“语域”研究的理论基础,更是和语用学先驱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有颇多契合点。而马氏所提出的“文化语境”这一概念,更是为当今语境研究中是否应当将交流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的佐证。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马氏的以语境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观在那个以只注重形式描写,连意义问题都少有人问津的时代有些回避主流,另辟蹊径的味道;与当时的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语法学派的理论相比,马氏的语言观又多少显得有些曲高和寡。然而在语言学研究,特别是有关语境的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马氏的语境理论在笔者看来却蕴藏着极高的再研究价值和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马氏语境观的形成过程

马氏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指出语言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而认为语言中的话语的意义

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所发生的上下文,即语言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颇具远见的语言观的形成,竟源自于马氏的一次并非以语言为研究目标的野外实地考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氏独自前往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上从事他的有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但是一开始马氏就发现自己的研究要想进行下去,有一个障碍不得不去跨越,这就是语言。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时马氏本可以走个捷径,因为当时要想在澳大利亚当局治下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找到一个通晓英语和当地语言的翻译并非难事,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为了亲手掌握第一手资料来开展自己的调查研究,他开始亲自学习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马氏尊重第一手语言资料的严谨治学态度让笔者印象深刻。正是在学习当地土著的语言、亲身探寻语言素材的过程中,马氏的语言观开始悄悄在他的头脑中萌芽。

在马氏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观察并记录当地土著居民捕鱼和农耕过程的过程中,他发现要想把这些土著居民所使用的语言翻译成英语极为困难。一次马氏坐在海滩上,观察当地渔民驾驭着自己的独木舟在风浪中行驶。当渔民们在独木舟之间吆喝喊话的时候,他听到有的人会直接把他们手中的桨称为“wood”(木头)。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不把这个人的话与当时说话的环境相结合,听话人就无法理解这里所谓的wood到底指的是什么。根据这些观察,马氏认为为了了解一个文化集团的具体的言语交流,单单是能理解或者是能写下他们当时所交流的话语的意义是不够的。必须要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以及他们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中把这些话讲给了另外一个人听。进而马氏指出:“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接着他又说:“一个单词的意义,不能从对这个单词的消极的冥思苦想中得出来,而总是应当参照特定的文化,对该单词

的功能进行分析后才能推测出来。^{[1] 158}”所以,从总体上说,马氏认为只有在文化语境,特别是只能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中,才能对一段话语的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估。作为马氏语境观的两大支点,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同时也是马氏语境观成熟的标志,而现代语用学在语境研究中所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发展在笔者看来都是对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必要补充,使得这两个概念更加丰满充实,具有时代感。

三、“情景语境”理论与“言语行为”理论比较

提到语境研究,我们当然就会想到语用学。如我们所知,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年轻的分支学科,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和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具体些,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即语境(context)中如何使用语言。语境也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在论及自上世纪以来对于语用学做出过奠基性贡献的语言学名家的时候,在诸多语言学或语用学的典籍资料中极少能看到马氏的名字,这在笔者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前文所述,马氏早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就提出了自己对于语境研究的系统认知和思考,认为语言的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对于语言的研究就是徒劳和没有实际意义的。下面笔者拟对马氏语境观与当代语用学研究中被视为经典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一概括性比较,从而证明马氏语境观对于现代语用学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955年,英国哲学家、被公认为现代语用学奠基人之一的奥斯汀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系列的讲座,题为《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在其中集中阐发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根据该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是在实

施某种行为。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即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大推动了语用学的发展。同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的伦敦学派的创始人、马氏的好友弗斯接受并全面系统的阐发了马氏的“情景语境”这个术语,并且给它做了更加确实的定义。在该定义当中,语言行为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范畴。

A. 参与者的相关特征:即是哪些人,有什么样的人格,有什么样的有关特征。

(1)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2) 参与者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

B. 有关语言的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

C. 语言行为的效果。

以上定义中所提及的“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语言行为的效果”等,就是马氏所认为的“情景语境”^{[1] 159}。

马林诺夫斯基和奥斯汀这两位著名的英国学者在各自对于语言研究的观点和论述,即对于“言语行为”理论和“情景语境”概念的全面阐释上,在言语本身、言语效力和言语影响三方面都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见表1)

表1 “言语行为”理论与“情景语境”理论比较

	奥斯汀的 “言语行为”理论	马氏及弗斯的 “情景语境”理论
言语本身	言内行为(为了叙述某事而说出的话,或称“言之发”)	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言语效力	言外行为(在说出话语时不仅仅叙述某件事,而且做出了某件事,或称“示言外之力”)	参与者言语行为之外的行为及有关语言的非语言性、非人格性的事件。
言语影响	言后行为(说出话语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或称“收言后之果”)	语言行为的效果。

虽然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哲学语言学家塞耳(J. R. Searle)后来在很多方面完善和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他所提出的命题内容行为的概念也为

弥补奥斯汀理论中的缺陷提供了合理的解决办法;虽然“言语行为”理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也受到了 D. Sperber 和 D. Wilson 等学者的质疑和诟病,但这些都无法改变“言语行为”理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奥斯汀提出后大大推动了语用学发展的事实。以上笔者对于“言语行为”和“情景语境”两大理论的初始状态的主干框架进行了横向比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奥斯汀和马氏的理论贡献为基础,言语行为本身和言语行为的环境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成被初步彰显。

当然,弗斯在阐释“情景语境”过程中也为丰富该术语做了重要的理论补充,但“情景语境”的核心理念仍是主要基于马氏的研究和贡献。换言之,马氏才是“情景语境”概念的“专利持有者”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了语言学界的广泛认同。虽然马氏和奥斯汀的正式身份都不是语言学家,但两人对于语境研究所提出的观点对于后来的语用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马氏对于语境的分析和解读还要早于奥斯汀,然而后来的语用学研究者却普遍把后者的论述看作是语用学研究的经典理论,而前者的贡献却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在语用学研究领域马氏的理论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但是仔细研读当今的一些主流语言学理论,仍旧能够看到马氏语境观并没有被完全遗忘,反而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新的面貌展现在语言学研究者们面前。这其中以弗斯的学生、当今语言学界颇具影响力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学派的主将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贡献最为突出。韩礼德把经由马氏提出并经过自己老师完善的“情景语境”理论落实到了具体的语言结构当中去。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情景可以由“场景(field)”、“方式(mode)”和“交际者(tenor)”三部分组成。场景是话语在其中行

使功能的整个事件,以及说话者或写作者的目的。因此,它包括话语的主题。方式是事件中话语的功能,因此,它包括使用语言的渠道(临时的或者有准备的说或写),以及语言的风格或者修辞手段(叙述、说教、劝导、应酬等)。交际者是指交际中的角色类型,即话语的参与者之间的一套永久性的或者暂时性的相应的社会关系。场景、方式和交际者一起组成了一段话语的语言情景^{[2]22}。语言的语义可以分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交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①。当语言情景的特征反映到语言结构中去时,场景、交际者和方式这三者分别趋向于决定概念意义、交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的选择,这样一来,韩礼德就成功地把语言的情景落实到了语言本身的语义上去,具体地说明了情景与语言本身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著名的“语域(register)”的概念。语域是语言使用中由于语言环境的改变而引起的语言变异。语言环境的场景、交际者、方式三部分组成,都可以产生新的语域。从上面对于韩礼德语域理论的简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马氏的“情景语境”理论在经过了伦敦学派两代巨匠的补充和完善之后,依旧在当今语言学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四、不应被忽视的“文化语境”研究

如前文所述,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是马氏语境观的两大支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两大支点在当今语言学研究中可谓地位悬殊。如果说在现今的语言学研究所公认的研究成果里还能清晰地找到“情景语境”理论的风采的话(如韩礼德的“语域”理论),那么比较而言,关于“文化语境”的研究用少人问津来形容几乎是不为过的。在跨文化交流变得日趋频繁的今天,作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媒介和社会现象的语言,也正在扮演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

①三种功能是韩礼德在全面阐述其功能语法的过程中对于语言纯理功能的划分。

下,“文化语境”这个曾经在语言学领域让人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终于得到了它应得的关注。文化语境一方面关及文化和语境这两个对于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概念,但在另一方面,文化语境常常被简单地等同于“文化+语境”的“1+1=2”的组合。在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不断深入的今天,笔者认为值得对文化语境这样一个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曾经在语言学界得到过广泛认同但却由于各种原因常被无意识忽视和误读的概念重新进行解读和思考,这样的过程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虽然文化语境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然而要给它下一个全面系统的定义却并不容易,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期间反映出了语言学界对于这一重要概念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相对于情景语境而言,马林诺夫基本人在当初提出文化语境的时候并没有能够给其一个相对完整全面的定义。弗斯在后来也只是进一步系统阐发了与具体话语交流关系更为密切的情景语境的理论,而对于文化语境,只是将概括为“说话者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1]159}”或者将其称为“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3]172}”。韩礼德和哈桑在提出他们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的过程中尝试将文化语境和文化等同看待^{[2]100},在丰富和细化了构成情景语境的关键因素的同时尽管没有能够清晰定义文化语境,但充分表明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文化语境这一关及当代语境研究的重要概念。

中外很多语言学著作在谈到文化语境时要么浅尝辄止,要么以寥寥数字一笔带过。直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契(C. Kramersch)在对语言与文化之间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于文化语境给出了如下定义——文化语境是指为一个话语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①^{[4]127}的所有成员所共享的、能够促成其言语交流意义有效实现的知识储备、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等主观属性^{[4]126}。该定义以话语交流者

本身为中心细化了文化语境的范畴,同时也相对明确地定位了文化语境不应归于“语言性语境”,而是涉及人们意识形态及主观因素中的特定领域,即点明了文化语境“非语言性语境”的特点。明确了言语交流过程中各方的主观属性不应在语境研究中被刻意忽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得出文化语境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在很多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参与交际的各方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会随时处于不同的话语社团,因此,他们的文化语境地位也是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同时在地位上也是强弱分明的。如果要使得交流顺畅进行,就必须使得这样的强弱分明的形势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被淡化。当然,这就需要处于文化语境强势地位的交际者在交流过程中采取灵活务实的言语交际策略。

五、“文化语境”与语境的关系

要想实现言语交流的目标,交流的各方,不管是否是同一个话语社团的成员,都必须把组成语境的各种要素充分予以考虑。然而由于目前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对于语境的理解在观点上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因此,如何明确这些要素的本质也同样并不简单。这也成了如何全面定义语境的一个主要障碍。美国语用学家尤尔将语境定义为“某一词汇能够运用于其中的物理环境^{[5]21}。”即“口语或书面语的上下文”。这是目前普遍能够得到认同的狭义的语境定义,然而如何从广义上定义乃至进一步解读语境殊非易事。在笔者看来,是否将话语交流各方的主观因素考虑进广义的语境定义当中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郑荣馨认为:“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立足点必须非常清楚、端正、牢固……将语言的使用者也包括进语言环境中去,就意味着语境自己把握自己……语言环境不应该包括说写者自身

①在使用口头或者书面语言过程中拥有一套能够被所有成员接受的共同的、同时也是公开的行动目标的社会团体。

的诸种特点……语言环境是与说写主体有关的客观环境^{[6]11}”。王德春和陈晨提出广义的语境包括言内语境与言外语境,即语言使用的主客观因素。其中“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是客观因素,说话者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等是主观因素”^{[7]37}。荷兰学者范·迪克强调社会认识成分,进而主张社会构造和话语之间尚有一个环节,即语境。他提出心理模型(mental model)和情景模型(situational model)。根据他的观点,语境是动态的,是大脑的主观产物,不是客观的^[8]。王和陈在论述自己对于广义语境的理解当中强调了说话者的主观因素的重要性,甚至将这些因素归入了定义语境的范畴;而范·迪克进一步强调了语言环境不应该只是包括与谈话主体有关的客观环境,谈话者自身的主观属性则成为描述语境定义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由此可见,当下的语境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肯定了言语交流各方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以强调交流者主观因素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语境的地位在以上几位学者对于广义语境定义的探讨中进一步得以凸现。其中王和陈对于广义语境的解读在诸多方面与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语境观有颇多的契合点(见图1),也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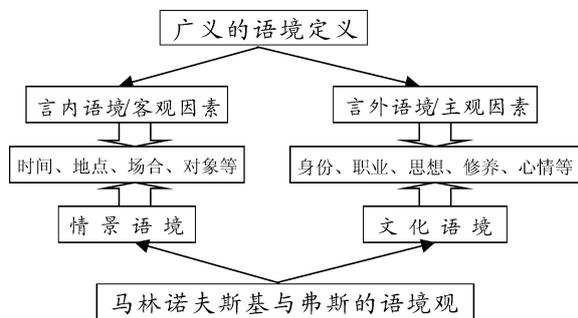


图1 广义语境与马氏及弗斯语境观比较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语境研究已经进入了多元化的时期,许多国内外学者在描写语境主观因素特征方面均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如萨伊

德把说话人的语境知识分成三个方面,即:(1)从物理语境可以估计到的;(2)从已经说的话当中可以找到的;(3)从背景知识或共享知识中可以找到的^{[9]182}。胡壮麟(2002)认为萨伊德所说的语境知识的第三点是指背景、常识、百科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现实世界知识等^{[10]161-166},而这些同时也是构成文化语境的主观因素;在国内,彭宣维在分析过语用学家 Sperber 和 Wilson 对于语境的定义^①后认为语境概念虽然是从话语理解的角度界定,但同时也阐明了语境的社会认知本质:不论物理语境的影响力度有多大,都需要通过人的感知过程,在激活储存于长时记忆中的相关经验知识后,在意识状态下新输入的信息通过被激活的旧有信息得到识别,然后才对语言编码和解码发挥作用^{[11]171-177}。彭宣维认为这里的前提是人类迄今积累的既有经验知识和集体认识水平,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前提就是对文化语境的一种颇具提炼意义的解读。

通过以上对于语境定义及语境与文化语境关系的探讨与分析中可以看出即便是今天,在从广义的层面上定义语境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谈话者的各种主观因素考虑进来仍尚存争议,而笔者却认为如果想全面系统地定义语境,把谈话者的主观因素完全剥离开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古诗有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可以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仅仅具备天时和地利,如果没有人和,言语交流也无法顺利下去。而这个“人和”恰恰反映出以交流者主观因素为主要载体的文化语境对于交流目标顺利达成的关键意义。综上,文化语境与当代的各种关于语境的研究的关系是互补的。由于涵盖了语境研究中主观因素的几乎所有内容,文化语境既可以被看作是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语境研究中的关键研究内容之一,同时也对当前多元化语境研究起到积极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① Sperber & Wilson (1986)将语境看作是“一种心理构造,是听话人有关世界的一组假设,从而影响人们对话语的解释。这一意义上的语境不只是关于直接的物理环境或前文的信息;对将来的期待,科学假设,或宗教信仰,轶事记忆,一般文化假设,对说话人心理状态的推测等,均可对相关话语的解释发挥作用。”

用。反过来说,当今语境研究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都是在某个层面上把对于文化语境的认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六、结 语

本文综合论述了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观及其两大支点——“情景语境”理论和“文化语境”理论。由这两大支点构建的马氏语境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相比较于同一时期的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三十年后才形成气候的著名的乔姆斯基革命,马氏语境观都有其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然而让人觉得遗憾的是,马氏的这些在语言研究方面颇具价值的理论贡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足够的重视。如前文所述,提及语用学研究,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奥斯汀和他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但往往不会想到奥斯汀的同胞马氏更早提出的

“情景语境”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马氏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文化语境”理论,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很多人的感性认识上是似曾相识,然而在理性认识上却是十分陌生的。当前,对于语境研究已经进入到多元化的阶段,能够集中概括和反映言语交流者主观因素的文化语境与各种关于语境的研究的关系既是密不可分的,同时更是互为补充的。当今语境研究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在某个层面上让我们对于文化语境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成熟。先抛开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贡献不谈,他在语言研究,特别是在语境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和理论贡献,在今天看来都并不过时,而是以别样的神采在现今的一些语言学理论中得以重现,进而推动着我们对于语境的研究朝着更加多元且与时俱进的方向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冯志伟. 现代语言学流派[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58-159.
- [2]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M]. G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1989: 22, 100.
-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 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72.
- [4] Kramsch, C. 1998. Language and Cul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6-127.
- [5] YULE, G. Pragma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 [6] 郑荣馨. 语言得体艺术[M].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11.
- [7] 王德春,陈晨. 现代修辞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7.
- [8] 何自然. 语用学中的语境[R].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8.
- [9] SAEED, J. L. Semantics [M]. Oxford: Blackwell, 1997: 182.
- [10] 胡壮麟. 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161-166.
- [11]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1995.
- [12] 彭宣维. 以社会—认知为基础的“过程—维度”语言模式[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3):171-177.